

寒露惊秋晚 朝看菊渐黄

文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李元

◎ 诗词歌赋

晨雾漫过阶前时，才觉秋已深至骨缝里。瓦檐垂着的蛛网上凝了细白的霜，风掠过树梢，叶尖便坠下一滴凉。檐角的风铃还沾着昨夜的露，轻轻一碰，便将“寒露”二字抖落在阶前——是菊瓣染了冷香，是柿果悬了红灯，也是时光在叶尖凝成的诗，等着人俯身拾起，读进岁月的褶皱里。10月8日迎来寒露节气，这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。这之后，寒气渐生，昼夜温差较大，早晚会感到寒意。同时，寒露也在不知不觉间，送来了五彩斑斓、如诗如画的深秋。

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兰衰花始白，荷破叶犹青。独立栖沙鹤，双飞照水萤。若为寥落境，仍值酒初醒。”白居易的这首《池上》是典型的寒露时节写景抒情之作。凉风吹动，寒露凝结。兰花越来越白，渐渐凋零，荷叶虽残破但依然是青绿色。沙鹤独自栖息在沙地上，双双飞舞的萤火虫映照在水面。从兰花的衰败、荷叶的残破，到沙鹤与萤火虫，从植物到动物，一静一动，描绘出一幅秋意渐浓的画面。在诗的尾联，诗人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，将醉醒后的寂寥之感与眼前的秋景相融合，既有对秋天萧瑟之景的描写，也有对孤独、寂寥等人生境遇的深刻反思，体现出诗人深邃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世界，是寒露时节写景抒情之佳作。

节令已到深秋，寒意更浓，萧瑟之感更甚，许多这一节令的诗词也表现出强烈的悲伤、愤懑、惆怅等情感。比如李郢的这首《早发》：“野店星河在，行人道路长。孤灯怜宿处，斜月厌新装。草色多寒露，虫声似故乡。清秋无限恨，残菊过重阳。”这首诗以旅人的视角，描绘了早行时的所见所感。荒野小店上方星河高悬，旅人前行的道路漫长无边，烘托出旅人的孤独和路

途的艰辛。“孤灯怜宿处，斜月厌新装”，运用拟人化的手法，赋予孤灯和斜月以情感，生动地表现出旅人对住宿环境的陌生和不适。而草地上的寒露和虫鸣声，又勾起了旅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。深秋时节，旅人心中本就充满了怨恨，而重阳节过后的残菊，更增添了时光流逝、身世飘零的感慨。诗中提到了一个传统节日——重阳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，今年重阳并非在寒露之后，而是推迟到了霜降之后。这是因为今年有闰六月，中秋节和重阳节对应的公历日期

都被显著推迟。去年的重阳节正是在寒露之后。

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：一候鸿雁来宾（鸿雁飞往南方），二候雀入大水为蛤（雀鸟不见了，海中的蚌蛤产出变多），三候菊有黄华（菊花普遍开放）。在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寒露九月节》中，对这三候有生动的描写：“寒露惊秋晚，朝看菊渐黄。千家风扫叶，万里雁随阳。化蛤悲群鸟，收田畏早霜。因知松柏志，冬夏色苍苍。”诗中“万里雁随阳”描绘了大雁随着太阳南飞的景象；“化蛤悲群鸟”一

句，则化用了“雀入大水为蛤”的典故；“朝看菊渐黄”则直接描写了菊花渐渐变黄的情景，与第三候“菊有黄华”相契合。这首诗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寒露的核心：既写尽“雁南飞、雀化蛤、菊渐黄”的三候特征，也点出“风扫叶、畏早霜”的深秋景与农事忧；末句借松柏“冬夏常青”转折，从对时序凋零的轻怅，升华为对坚韧品格的赞颂，是一首“写实节气、暗抒心志”的佳作。

寒露的诗行里，藏着深秋最细腻的底色：菊黄染了晨露，雁影掠过晴空，霜风卷着落叶，也催着农人惜时收田。待读到松柏常青的字句，才懂这节气从不是凋零的终点——它以清寒为笔，一边勾勒岁月的流转，一边悄悄写下关于坚守的答案。合卷时，窗外风凉，却也多了份对时节与生命的温柔感知。

“官”与“吏”有何区别？

经常可以看到、读到“官吏”一词，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名词，指的都是“官儿”。其实，在中国古代，“官”与“吏”不是一回事，两者虽然同属治理阶层，却在身份、职责和地位上存在着显著差异。

先秦时期，“官”与“吏”的界限并不清晰。如《左传》中提到的“三吏”，指的是太师、太保、太傅这样的高级官员，而非后世意义上的“吏”。战国时期的李斯，年轻时曾担任“郡小吏”，但这里的“小吏”更类似于基层官员，而非后来的文书办事员。总体讲，在早期，“吏”并非低贱职业，而是泛指各类治理者。

秦汉时期，随着官僚制度的逐步完善，“官”与“吏”的区分逐渐明显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，县令、县长属于“官”，而县丞、县尉以下的“斗食”“佐史”等则为基层办事人员，属于“吏”。此时的“吏”虽地位较低，但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，如汉高祖刘邦早年通过考试成为“泗水亭长”，萧何、曹参也曾担任地方吏职，而后均跻身高层。不过，吏员的权力并不容小觑。西汉名将周勃曾因被诬陷而入狱，饱受狱吏欺辱，最终不得不贿赂狱吏以求脱身。出狱后，他感慨道：“吾尝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狱吏之贵乎！”可见，在当时即便位高权重，官员在具体执行层面仍受制于吏员。

隋唐时期，科举制的推行，推动“官”与“吏”的分野逐渐明晰。科举制是官员选拔的重要途径之一，官员多为朝廷任命的流内官，享有明确品级与俸禄；吏员则多为处理具体事务的基层办事人员，以流外官为主，部分中央机构吏员如令史、书令史有从九品下等流内低品。不过，在唐代，部分流外吏员可通过考核获得晋升为官员的机会。中央机构吏员，多由官方按制度选拔。

宋代以后，吏员的地位进一步滑落。彼时官员多为科举出身的文人，虽饱读经史却鲜少具备实际的政务经验，地方治理便不得不倚仗那些熟悉本地风土、通晓政务流程的吏员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感叹：“百官者虚名，而柄国者吏胥也。”这种深度依赖，让本无正式权力的吏员，得以在税收征管、司法裁判等领域暗做手脚，甚至在局部场合架空朝廷派来的“空降”官员。

尽管官与吏的地位天差地别，二者的关系却颇为微妙。官员要靠吏员打理文书起草、税收征缴、案件协办等具体事务；吏员则依附于官员，既需凭官员发放的薪俸维持生计，也盼着借官员之力获得提拔机会。不过，吏员多为本地人，熟稔地方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，常会与当地豪强勾结，行欺上瞒下之事。官员若不通实务、不谙世故，很容易被吏员蒙蔽，甚至可能因吏员的贪腐行径而受到牵连。

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，身为郓城县押司这般“刀笔小吏”，便常因出身低微而自觉气短。每逢梁山好汉推举首领时，他总忙着谦让，口口声声说“小吏”不配居高位——这一细节，生动折射出当时吏员的尴尬处境：即便在实际事务中握有一定实权，却终究难获真正的社会尊重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